

November 2021

Transforming Anecdotes into Fiction: Zeng Pu's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nd the Study of Anecdo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Quan We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ei, Quan. 2021. "Transforming Anecdotes into Fiction: Zeng Pu's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nd the Study of Anecdo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6): pp.55-6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6/2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以掌故为小说

——曾朴的《孽海花》与晚清民国的掌故之学

魏 泉

摘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文学立场回看晚清小说，无论梁启超的“新小说”、鲁迅的“谴责小说”，还是旧文人的“鸳鸯派”小说，都被归入了“旧文学”的营垒。但若以小说观和女性观来衡量的话，曾朴的《孽海花》都是“新小说”而非“旧小说”。其“以掌故为小说”的文学实践，不仅打通了章回体与笔记体的传统小说样式，也能以西方文学的小说观念为参照，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期，适成为新旧文学的桥梁。《孽海花》写了才子佳人，但不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而是其终结；写晚清历史，也不是历史演义体，而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是一种风俗志式的呈现；作为描摹官场士林之小说佳作，从类型小说的角度，也可视之为中国“学界小说”之先驱，上继《儒林外史》，下开《围城》，倘与欧美“学界小说”所描写的士林画像及学术场域对照磨勘，更可知曾朴的《孽海花》有其不可磨灭的文学贡献。

关键词：曾朴；《孽海花》；掌故之学；学界小说

作者简介：魏泉，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文、都市文化、图文及谣言等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40。电子邮箱：qwei@zhwx.ecnu.edu.cn。

Title: Transforming Anecdotes into Fiction: Zeng Pu's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nd the Study of Anecdo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terature after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Liang Qichao's "new fiction", Lu Xun's "satirical fiction" and old scholars' fiction from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are all classified as old literature. Y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fiction studies and feminism, Zeng Pu's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is a new, instead of an old, novel. Its literary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anecdotes into fiction", by integrating the style of the chaptered novel, note-form fiction, as well as western fiction, connects the old and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ther th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s brilliant depiction of Late Qing history and its officials and gentry contains rich life details and customs. As China's pioneer of "academic fiction", it links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Besieged City*, thus making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fiction.

Keywords: Zeng Pu;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the study of anecdotes; academic fiction

Author: Wei Quan,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ancient literature, old-fashioned poetry in modern literature, urban culture, pictures and rumors. Address: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qwei@zhwx.ecnu.edu.cn

关于晚清小说，我们最熟悉的是鲁迅《中国

小说史略》中所提到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此书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讲稿，初版于1926年。鲁迅的文学修养及品位，以及对晚清小说的熟悉，都颇具权威性，被他论及的几部晚清作品，遂以“谴责

小说”之目而进入了文学史。

“谴责”这个概念,在鲁迅那里是从讽刺小说的脉络而来,谴责要比讽刺更重口味一点。鲁迅在谈谴责小说时,无论是主题,还是写作风格及技巧,主要指的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小说都以“连缀话柄”的方式揭发官场腐败之弊恶,而又“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达不到讽刺的艺术高度,故别谓之“谴责”。说到谴责,刘鹗的《老残游记》“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并首揭“清官之恶”;曾朴的《孽海花》“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得并列于鲁迅所谓“谴责小说”之“四大”。其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的此类小说在晚清颇多,或流于“谤书”(不真实),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堕为“黑幕”(鲁迅 291)。

此后的晚清小说史叙事,一直将“四大谴责小说”作为主要作品论述,而学界则一直有研究者致力于辨析四书的不同,指出《老残游记》是政治小说(或文化小说),《孽海花》是历史小说(或政治小说、风俗志小说等),尽管二书都有谴责的成分,但真正引人关注的,并不是谴责官场,而是另有所在,殊不宜以“谴责”限之。相比之下,鲁迅对《孽海花》的评价,曲解尤多。此后学界关于《孽海花》一书主题的讨论,众说纷纭,各具只眼,但揆之原作,却又让人觉得此前诸说皆有未明与未尽之处。即以最能近之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风俗志”等来标记和解读《孽海花》,仍不如说曾朴撰写此书,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以掌故为小说”,来得更显豁。从掌故入手,联系晚清民国掌故之学的线索脉络,可以作为解读曾朴《孽海花》的一把钥匙。

二

关于《孽海花》“以掌故为小说”的著述立场,曾朴本人在《孽海花》第一次结集出版时所附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有很清晰的表述。此书之作,并不起于曾朴,最初发起此书并作了前几回的,是金松岑。而金松岑所作,“过于注意主人,不过描写了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

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孽海花》附录3 11)。可见,如果依着“孽海花”这样一个名妓传奇的原型(或者说是类型)来刻画一个女性形象,无论写得再怎样好,哪怕是媲美《海上花列传》,亦非曾朴所愿。依曾朴之见,“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曾朴 312)。因此,书中那些与金雯青、傅彩云无关的文字,像皇家的婚姻史、官场文人的聚会谈资,所谓“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非但不是因为小说结构不够紧凑的等闲笔墨,反而正是作者真正的命意所在。

此书出版后,一方面得到了读者极大的欢迎和肯定,行销不下五万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新文学专家胡适的批评,认为其连缀短篇故事的结构和关于孽报的描写,不是高明的小说家所为。胡适在19世纪20年代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名家,他的批评在当时很受各方重视,也因此而有争议。

曾朴在为自己的创作辩解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们的想象[……]”。而林纾以《孽海花》“鼓荡民气”“描写名士狂态”对曾朴赞许有加,曾朴又辩称,那“不过附带的意义,并不是他的主干。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拢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曾朴 313)。

曾朴在这里所说的“避去正面”,专注于琐闻逸事,将“数十年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贯穿于小说,合拢一些关于晚清政治变动和文化推移过程中的“侧影”“远景”“细事”的追求,殊有别于固有的历史演义小说,也不同于讽刺谴责的趣味,而与晚清以降士大夫文人考究掌故的风气趣味一脉相通。因此,蔡元培说:“《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的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

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蔡登山编 60)而胡适认为《孽海花》“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胡适 28),也是认为曾朴的书,更近于掌故笔记,而非小说佳构。

胡适说《孽海花》只能算是二流小说,是把札记之体与小说文体区别开来的,对此,不只是作者本人在改编增订时特别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就是在当时,也有读者对胡适的说法不以为然,吴耀祺的《孽海花考证》可为例证:

近代小说家群推李(伯元)吴(趸人),而东亚病夫亦以《孽海花》享盛名。全书以名妓傅彩云为主,而同光两代逸闻轶事,网罗无遗。描写名士习气,如温犀照渚,尤为淋漓尽致,洵稗观中之上乘也。或有病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而不得为佳小说者。然杰作如《儒林外史》,隶事亦至夥,而布局之松懈,反较《孽海花》为甚。乃吴敬梓则奉为安徽第一大文豪,东亚病夫则贬为第二流小说家,其识见之谬,论断之偏,可以见矣。(吴耀祺 15)

这里的分歧,表面看是对曾朴作为小说家优劣的评鹭,但其实对于《孽海花》之网罗同光两朝逸闻轶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当时官场文苑的名士习气,是有共识的,分歧在于:

一、“以笔记掌故为小说”,是否合于小说的叙事文体?

二、如此脱离小说主题(名妓傅彩云)而津津乐道各种传闻轶事,能不能算是“佳小说”?

先说第一点,在清末民初,所谓小说的概念,合古今中外于一炉,实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文体样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有清晰的梳理(鲁迅 6—18)。“小说”在中文里的原义,本多出于道听途说,而小说家与杂家,亦时分时合。至清末,中国传统的小説,既有道传奇、讲演义的章回体,也有记言行、述佚闻的笔记体,则笔记可以为小说,当无疑义。但是,笔记之体,与从西方传入的小说观念,有一大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强调虚构,即其文学性,有别于史学的客观实证性;而笔

记之记言行轶事,则重在有此一说,这种说法不出于作者的拟想,而是一种记录。

笔记之体,在补史之阙这条线索上,以其广见闻、资考证,在晚清士大夫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有关于朝章国故的掌故之学,所谓掌故笔记之作,在清末文人留下的著述中堪称独盛,于史学一门中,可谓以附庸蔚为大观。

关于第二点,小说既然名为《孽海花》,如绳之以西方之“小说”观念,当然是应该对标《茶花女》或《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写法,集中笔墨于主角傅彩云的人物形象,以其生平经历与命运起伏为线索,写出社会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这是成为一部“好小说”所不可缺少的。而曾朴的《孽海花》,第一回是“楔子”(主要出自金松岑之手),第二回则开篇是从同治戊辰会试(1868年的科举考试)说起,引出小说的男主人公——科举状元金雯青。小说前七回,都在写官场交游,作为本书主角的傅彩云,直到第八回才露面。而一开始,曾朴的《孽海花》一共只写了二十回,傅彩云之出场,是有些晚了。如果说,此书主要是为了刻画男主人公金雯青,则为何曾朴原定要写六十回的小说(最终完成了三十五回),却在第二十四回,金雯青就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如果从小说塑造典型人物这个功能上看,《孽海花》的小说结构安排,的确不能算是佳构。但是,这样一部小说,在出版后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能够让读者反复索隐,津津乐道,欲罢不能,而被鲁迅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似乎又不能不承认,《孽海花》作为小说,实属佳构。这种看似矛盾的地方,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斑驳混杂有关。

曾朴关于“珠花式”小说结构的自我辩解,与其说是对《孽海花》小说结构之独具匠心处的提点,不如说是谙熟法国文学的曾朴,对于小说“应有较为复杂的结构”这种小说观的认同。而在这部小说中,最能体现出他所说的“前后照应”的地方,当属第十五回,对傅彩云与瓦德西在德国即有过从这一段内容的虚构。^①这一段本为后来庚子事变中,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之传奇关系的铺垫,很可惜,曾朴本人终其一生,也只把小说写到了甲午前后,令读者无缘看到这朵“珠花”在小说中完整的呈现。

蔡元培先生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直言此书中傅彩云与晚清社会最有关系的举动,

“还是拳匪之祸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而曾朴“起草时已在拳匪事变后七年,为什么不叙到庚子,而绝笔于‘青阳港好鸟离笼’的一回”(蔡登山编 61)?蔡元培以不能起孟朴先生于地下追问其因为憾,曾朴之子曾虚白代父亲回应此问,则以曾朴自比“江郎才尽”,至死未能完成此书,告于读者。但这不是也恰恰承认了,此书在结构上有不够完整的遗憾吗?而一部结构并不完整的未完成之作,竟能如此“成功地引起读者大众的雅俗共赏,其真正贡献于晚清小说之处,当是别有所在了。

三

国人对于小说佳作,有一种特殊的揄扬方式,就是补作续书,曾朴这部未完成的《孽海花》也不例外。曾朴身后,也主要有陆士谔的《新孽海花》和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陆士谔袭用了曾朴他们六十回的回目,构成侵权,后来被毁版了^②。张鸿则是曾朴同乡挚友,受曾朴之托而作续书。此书衔接真美善本《孽海花》一至三十回,由三十一回续写至六十回,仍以赛金花为线索,主要描绘了清末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两大历史事件,1941年在《中和月刊》二卷一期开始连载,后于1943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翌年还再版过一次。“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仅仅一年时间,《古今》就连续刊登了十余篇探讨《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纪果庵、冒鹤亭、瞿兑之、周黎庵、文载道等,其中除瞿兑之身处北京外,其他人都是当时沪、宁地区的文史掌故名。”(符静 152)

《续孽海花》一书的出版,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孽海花》一书与晚清民国掌故学的关系。连载《续孽海花》的《中和月刊》和登载相关谈论《孽海花》文章的《古今》杂志,正是20世纪40年代京沪两地掌故学家们发文的主要阵地,核心人物是瞿兑之、周黎庵、冒鹤亭、纪果庵等。

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一文,将曾朴《孽海花》一书的主要价值,明确定位于描写同光朝士之种种,认为书中描写名士狂态,虽云附带而非主干,但此点在书中“实为极精彩之处”:

清季自光绪庚子之役以后,舆论发

舒,小说家也应时竞起,大抵以政界或社会为对象,若吴趼人李伯元刘铁云之伦,家张一帜,各负盛名。其间曾孟朴氏以《孽海花》出而与世相见,藉名妓赛金花(傅彩云)为线索,演晚清史迹,妙于描摹,尤为个中翘楚。盖师友渊源,家世雅故,习知同光京朝风采,名人性行。而藻思健笔,复能就各种资料,善于运化,用使形形色色,点染如意。所写朝士之情态及谈吐,历历如绘,生动逼真,读之觉老辈风流,去人未远,斯其最难能可贵者。并时诸家,实无其俦也。(《关于〈续孽海花〉》1)

燕谷老人(张鸿)的续书,虽也依曾朴之体例,写戊戌、庚子中之人物轶事,颇可与史籍相表里,但文笔远不如曾朴《孽海花》精彩,也是一时读者的公论。瞿兑之对此并不讳言,但认为续《孽海花》与续《红楼梦》不同。《红楼梦》为凌空之作,续书者可见仁见智,自抒胸臆。而《孽海花》“明明以光绪初年至甲午间之朝局为背景,为主题,是确实不可移易的事,那么就非一直写到戊戌、庚子,或者竟至辛亥,不能算是全璧。所以《续孽海花》一书实在不可少”。张鸿此书,能不悖曾朴叙写“大事的全景”之志,并时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已经是很难得了。瞿兑之对《续孽海花》一书的发行、出版、修订,都颇费心力,功不可没。他说“我为什么热心于这部书呢”(《关于〈续孽海花〉》5):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关头都在我的一生经历了。垂老而逢此地变天荒之世,抚今追昔,履霜坚冰,然后知光绪朝史事之关系重要。[……]

我们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这三十年中的国民心理的变迁。这便要从社会各方面来看,而亟需要一部好的小说了。《孽海花》是一部好书,续书比起前书来,当然还差一点,然后以之为椎轮大辂之始,或者后人可以有一部空前成功的作品,亦未可知。(《关于〈续孽海花〉》5)

纪果庵也说：

余虽嗜史，而深恶正史。翻阅清史，殆个人之履历表，官阶表耳，其余个性，固无所描绘，即事实之肯綮，亦不愿明言。[……]而数十年来，以时事为背景之说部，迭出不穷，其中缘饰固多，然亦必有其质地以为根核。吾人欲明晚清之社会，转不如于此覘之。若《孽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续书恣纵，虽不逮正，惟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矣。（《〈续孽海花〉人物谈（下）》24）

可见瞿兑之、纪果庵等人，所看重《续孽海花》的地方，在于其仍欲“以掌故为小说”，以见光绪一朝的士大夫言论行事，而其小说艺术上与曾朴原作的相形见绌，也都在尚能“补史之阙”的考量下，得到理解、宽容和接纳。

曾朴的《孽海花》以掌故为小说，在小说文体上，是沿着《儒林外史》的路子，把固有的章回小说和笔记小说从形式上打通。其对于人物事件之历史背景，持一种有别于正史的立场、角度和趣味，“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曾朴 312）的写法，也颇得《中和》《古今》一班掌故学家的激赏，认为是此书最有趣味和价值的地方。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兴趣，因此多数不认同鲁迅“谴责小说”之定义的读者，会认为《孽海花》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在关系晚清三十年间之政局的意义上，《孽海花》也常常被看作一部政治小说。但是曾朴的本意，也不在于谈政治，而是写官场佚闻（士林掌故），以见时代风会。故“以掌故为小说”，才是曾朴与 40 年代的掌故家们别有会心之处。

关于掌故学之渊源，瞿兑之认为它导源于古代正史与杂事的分途和笔记之体的兴起，而直接动因则为救济旧式治史体裁的不足。他认为，正史与杂史之分途，由《三国志》启其端，而博采群书、引杂史入正史则由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肇始。关于掌故学的用处，瞿兑之也是着眼于对历史的记录：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动

不停的，而已经变动了的事物，往往如烟之逝，要想追摹起来以供参考，就很不容易。历史本身是不会留下记录的，如果不依靠具体的事物映写下来，则所了解的历史不能真实而正确。掌故学的作用就是把关于变动了的事物种种知识积累储存起来，以供应各种需要——特别是历史研究的需要。

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听雨楼随笔·序》2）

瞿兑之等掌故学家比较看重和强调的，是掌故对史学的补充作用，偏于“传信”的史的趣味，而对小说中富于“传奇”性的虚构笔墨，则不太感冒。周黎庵说：“一般对《孽海花》说部有兴趣的读者，大都寄重心于主角赛金花，即十年前逝世于故都的刘半农先生也是如此。而我们则不然，完全对于说部中的人物发生兴趣。对于赛金花，不但没有什么兴趣，而且还要从各家的记载中，指出原著人的荒谬，证明书中关于赛金花的种种风流绮事，都不大靠得住。这固然是大煞风景的事，但为了一点胡适之所谓‘历史考据癖’的存在，便顾不得许多了。”（周黎庵 13）纪果庵也说：“唯吾辈中年读此书[《孽海花》]，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自与专注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本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孽海花〉人物漫谈》13）这也是他们能对张鸿的《续孽海花》评价相对较高的原因。但小说毕竟是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小说的《续孽海花》，已极少为人提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曾朴的《孽海花》虽以掌故为小说，但也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一种新高度。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以《续孽海花》的出版为诱因，在这批掌故学者那里，将《孽海花》一书的读者，分成了“一般的读者”和“我们”。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界分。

“一般的读者”，感兴趣的是赛金花的传奇身世，从妓女成为状元夫人，又在丈夫死后再张艳

帜,并在庚子事变中与德帅瓦德西有染,而于乱世中有保全国人生命财产之义举。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虽取诸真人,而借助小说之虚构的特权,曾朴笔下的赛金花(傅彩云),既是孽海之花,也是自由之花。而“我们”感兴趣的,却是《孽海花》所写种种有关晚清官场士林的掌故,是“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我们”对那些“靠不住”的描写,不但不能欣赏,容忍度还非常低,对其荒谬之处,非要广而告之而后快。《孽海花》一书在晚清出版后的意外走红(曾朴称之为“幸运儿”),应该说跟同时满足了这两类不同趣味的读者群有关。

掌故之学,本起于官场(有关于朝章国故)。掌故与官场的关系也值得分梳,比如职官制度、风俗礼制、奇闻轶事,都是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像升官图之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掌故之学,虽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但感兴趣的人也不少。因此,谈掌故也有雅俗之分。雅的部分是拼学识、见闻、背景的,可以积累个人在官场及学术圈文坛的声誉,聚会宴请,谈言微中,也不全是附庸风雅的无聊应酬。俗的部分,多是八卦和小道消息,真假难辨,道听途说,耸人听闻,也是历来有市场的。对掌故学家如瞿兑之、徐一士而言,谈掌故,既要辨真伪,也要别雅俗。真伪之辨,靠的是史学考证功夫,而雅俗之别,在喜爱《孽海花》的读者中,就是“我们”与“一般的读者”之间的差异。

曾朴对《孽海花》的写作和修改,前后跨越二十多年的时空,中间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临终仍然未完成。20世纪30年代前期,因为曾朴改写《孽海花》,赛金花(傅彩云)也被媒体曝光尚在人世,吸引过大众猎奇的目光。30年代后期,又因为抗战中“国防文学”的走红,而有排演话剧《赛金花》的公共事件。这是《孽海花》的“一般的读者”所关注的主题。40年代,因张鸿《续孽海花》的连载和出版,而在京沪两地,以《中和》和《古今》为中心,再次引起有关赛金花史实的真伪之辨,参与其中者则主要是心系掌故之学的“我们”。那么,《孽海花》究竟是靠着哪些情节或笔墨,深深俘获了这些掌故学家的心呢?

掌故学在晚清非常盛行,比如说“究心掌故”“谙熟前朝掌故”,是对人见多识广的夸赞。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文人这种对掌故之学的趣味,还

是从龚自珍开始的,“近数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此语为多种文学史著作转相引述,朱杰勤之《龚定庵研究》谓此语出自张维屏,也有说此语出自程秉钊或魏源,但都未见具体出处)。龚自珍自己也在其《己亥杂诗》中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匱如搜采,来扣空山夜雨门。”(《己亥杂诗》第十二首)

掌故之学,在文史领域有其独特性。首先,掌故不承担宏大叙事,不承担意识形态职责,不是正史,而是避开正史;其次,关于真实性,掌故也有点模糊,掌故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传闻的,记录掌故的人不能保证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只能保证有人这样说过。就像钱基博说王闿运的《录祺祥故事》是逊朝一大掌故文字(钱基博 44),但其中关于肃顺事之无旁证之情节,可以言掌故而不足为信史。掌故之学,本来是正史的边角料,于史学为附庸,其于晚清之蔚为大观,一方面固然有补于正史之阙,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不少八卦和谣言的成分。这是因为掌故本身,是一种兼容真实和传说的文体,有些传说可能是谣言,但是这种谣言曾经传播过,却又为一种事实,非为掌故学者所编造。在真实与传闻之间,掌故这个文体比较有弹性,既可以记录一种谣言,也可以对此谣言作澄清和辨伪。

比如《孽海花》的风行一时,即因赛金花之事,是晚清一大掌故。曾朴以掌故为小说,欲以此一大掌故为线索,贯穿三十年中所见所闻之士大夫官场之逸闻轶事(也都是各有原型的士林掌故),以见光绪朝的社会历史变迁。故其虽为小说,却以“真人真事”为一大特点,所叙无不有所出、有所本。其中,关于龚自珍的死,以及火烧圆明园的起因,都成为此后广为流传的说法,并引起文史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如孟森、苏雪林等人的撰文考证。但是即便是大家发现,不论是龚自珍与顾太清的隐情,还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艳遇,都并非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也无法厚责于作者,更不可能要求作者将其改正。这毕竟是小说,小说作者出于叙事技巧的考虑和对文学性的追求,拥有在作品中虚构的权力。“以掌故为小说”,其实也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过于虚构则为无稽之谈,失去了“真人真事”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过于坐实则易流于无趣,也无以显示

作者在文学上的才华和造诣。像书中所涉之聚会宴请,席间之行酒令、臧否人物、拜祭先贤等场面,写到细腻逼真殊为不易。如果没有实际生活经验,那些细节是想象不出来的。而一定要有过真实生活经历,又敏感而富于文学的才华,才能膺此任。但以《孽海花》和《续孽海花》比较,可见续书作者虽也有亲睹亲历,所述也有其“补史”之价值,但是在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文学才华上,二者实不能相提并论。曾朴所谓“叙写的精神”,使其《孽海花》在“以掌故为小说”之余,别有一种“文艺上之境界”(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3),这也是为什么金松岑推给曾朴去写,而张鸿续书,虽义不容辞而又力有不逮的地方。

张爱玲《忆胡适之》中说到《孽海花》:

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在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也看不出幕后事情。

[……]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张爱玲 20)

由此也可见《孽海花》“以士林掌故为小说”,是曾朴对晚清小说贡献最大的地方,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能较好地利用掌故文体的弹性和文学的虚构权力。

四

《孽海花》一书的读者,在无关于考据(龚自珍案、赛金花案)的地方,也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

“我们”和“一般的读者”。这里的“我们”,主要是与作者同时代,而又有着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经历或见闻的读者,以及会对科举考试之细节及周边感兴趣的文人雅士。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人群,范围要比娴于掌故的旧文人圈子大,但又比津津乐道于赛金花艳史,而无辨识史实能力的一般读者圈子小。这个“我们”,是由受过传统科举教育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构成的。随着科举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此后一代一代的读者,就越来越对《孽海花》中写科举的这部分内容(包括状元的产生、制艺的商量、备考的文具、阅卷的过程、磨勘的花絮等)无感了。此后的作者,也再难对那个“学而优则仕”的科场官场,方方面面都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生动可感了。可以说,曾朴《孽海花》的独特之处,因其“以士林掌故为小说”,还可以将其当作一种类似于西方“学界小说”^③的类型小说来看。

小说第二回开篇从同治戊辰会试(1868年的科举考试)说起,引出了小说男主人公——这一年的科考状元金雯青(金钧)。科举考试是中国的文化特产,传统读书人最重要的出路和成就,都系于科举考试的成败。书里说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倍根,法国的卢骚呢? [……]”(曾朴 4)

状元金雯青的原型实有其人,叫洪钧(1839—1893年)。小说按他的生平历来写,却不是给他作传记,而是借着他的科场折桂、官场交游和宦迹所至,写了很多晚清名士的轶事和大小事件的佚闻。这些人物皆有原型,事情也皆有所本,取之于士大夫口耳相传的掌故,而非作者向壁虚构。这也是为什么晚清文人士大夫对这本书尤其感兴趣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小说里的人物原型;考科举、办文会、吃花酒、谈洋务,也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内容。《孽海花》等于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文人群体的自我写照,就像欧美学界小说中主要描写教员的教授小说,其读者群体以及评论者也是以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学院中人为主。

作为类型小说的“学界小说”,是有其专业门

槛的。一个从未在大学里教过书的作家,很难写好一个教授的专业研究。可以说,专业性是“学界小说”的硬指标,以此为标准划出的“学界小说”的边界,既限制了作者的数量,也限制了读者的数量,使之成为一个小众的领域。今天的读者再读《孽海花》,对于其中谈科举的内容,比如“雅聚园”的聊天,“含英社”的制艺,翰詹大考的调墨、挖补,就未必会觉得多有趣。但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像蔡元培,就是因为“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蔡登山编 60),更因为背后有“影事”可据,还增加了读者的索隐(八卦)趣味。而这种趣味对于一般读者(后世读者)来说,是难以领会的。

《孽海花》里那些更专业的话题,像研究边疆史地、谈论今文经学,都是同光间的学术新潮流,了解学术背景的人读来趣味盎然,别有心会;看不懂的人就难免味同嚼蜡,兴趣索然。这也是此书读者会分为“一般的读者”和“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界小说”在欧美,基本上被评论家认为属于讽刺小说的一类。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鲁迅会把《孽海花》看作“谴责小说”。但曾朴笔下的官场士林,与其说意在讽刺、谴责,不如说更多的是借士林掌故中的趣闻轶事为士大夫写照。如写龚自珍和宝廷之事,都是如此。曾朴自己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写雅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地含蓄着这两种意义。”(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蔡登山编 94)可见,以佚闻掌故的方式写出这一时期文化的推移,正是曾朴拟想中本书的主干之一(另一个是写出政治的变动)。正是出于如此清醒主动的创作意图,曾朴的《孽海花》才会在金雯青、傅彩云的情节主线之外,连缀许多的科场风气和文人聚谈,而成为一部读者因此而分层(群)的“学界小说”。鲁迅谓《儒林外史》“婉而多讽”,这其实也是“学界小说”的特性之一,从《儒林外史》到《孽海花》,再到《围城》,这是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学界小说”的一个脉络。常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围城》写学界中人要用一副如此冷峻的笔调,将那些教授们写得如此不堪?殊不知,“学界小说”这种类型,本身

就是与讽刺文学同道。从这个角度解读《孽海花》的话,我们可以对它在晚清作为一部“新小说”的特质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为学界小说,《孽海花》的作者全用掌故,哪怕像龚自珍之死、傅彩云与瓦德西的异国艳遇这种被学者专家证伪的情节,也不是出于作者虚构,而是当时确有此一说。读者考证也是依赖于掌故笔记的记载,于是小说是借才子佳人故事为线索,来串联晚清掌故;读者则是一方面借小说所记之掌故扩大自己的见闻(八卦)视野,一方面又将自己所熟悉的相关内容,借着考证本事的话题而以谈掌故的形式参与进去,共同构成一个事实与传闻虚实相应、作者与读者切磋商榷的文学场域。这是学界小说的类型化特点,非学界中人既不感兴趣(对专业方面的东西不感兴趣,只出于猎奇、好奇),也插不上话,学界中人却以指摘专业方面的纰漏和书中人物原型为乐趣。

五

与《儒林外史》和《围城》不同的是,《孽海花》的读者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冲着赛金花的传奇人生故事而来的。这部《孽海花》本不是由曾朴发起的,而是金松岑先写了六回,并发表了两回。曾朴接过此书,纯属因缘巧合。而曾朴也借此书,抒写了他在男女情感方面的一些感想。本书从线索上看,是一部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年轻貌美的名妓嫁给了风流儒雅的状元,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可谓修成正果。可是,既然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曾朴的《孽海花》自写到傅彩云在金雯青去世后,脱离金家重新挂牌做回妓女起,已经脱离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类型,也可谓“扫荡名士美人之局”^④,回向写实主义,这也可视为曾朴“梦想改革中国文学”^⑤的一个努力。

虽然小说不是为了表现名士美人的命运,但是这个状元配名妓的组合还是特别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彩云嫁给金雯青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金雯青已经是四十八岁(三十岁中状元)。一个青楼女子能够嫁入状元家里(第二房妾)已经很幸运了,正房太太还把凤冠霞帔借给她,外交官丈夫携她出任驻外大使,都对她够好了,彩云是不是应该对得住这份好呢?虽然出身青楼,在国外毕竟是大使夫人的身份,是不是应该恪守最起码的

礼法？而彩云却是一路僭越出轨，从不消停，最后金雯青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气死的。这样一个女性，在传统小说里就是《金瓶梅》里潘金莲那种角色，淫荡不忠，红颜祸水，但是我们发现在《孽海花》里尽管曾朴写到了傅彩云这些败坏门风、背叛婚姻、玩弄感情的事情，但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谴责”，他的态度是呈现，也有点不赞成、感慨，但是没有道德审判。这一点在晚清就跟传统旧小说的“惩恶扬善”这种主流写法判然有别了。《孽海花》里面塑造的傅彩云这样一个被传统观念认为是尤物和祸水的女性，放在今天来看，却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晚清女性解放的先驱，是新女性的代表。^⑥她并未有意要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只不过生逢其时，加上个性张扬，她有聪明可爱的一面，也有无耻甚至狡诈的一面。在金雯青这样的精英男性在晚清不断败落的时候，傅彩云这个妓女出身的女性却一路上升，与金雯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金雯青和傅彩云，一个是起点最高的状元，可是人生之路不断落败：考了状元却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不通洋务，不会外语；研究《元史》，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却买到假地图，差点让国家遭受领土损失；娶了年轻貌美的小妾，却不能让她真正爱上自己，忠实于自己，不能约束她不去出轨，这也是一个男人不堪承受的失败。金雯青的败落，其实不是个人意义上的，他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和象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文化里面培养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都无法胜任朝廷的需要和外交的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事变，中国会经历一连串重大的失利。而与此同时，一个起点最低的青楼女子，却能在晚清的大变局中，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和不断晋升。小说中的傅彩云，不仅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玩物，反而差不多是一个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的女中豪杰。

曾朴对二人关系的描写，主要还是以记掌故为主，但是小说的效果溢出了掌故“补史之阙”的功能，而进入了文学塑造典型人物的空间，傅彩云成了晚清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

掌故学家高伯雨在他的《名妓赛金花的状元丈夫》一文中感慨道：

清代百多个状元中，能讲实学者不

过数人，洪钧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元史译文证补》，影响很大[……]洪钧早死赛金花四十多年，她的名字到今日还为人所知，但一代的史学家洪钧，只为少数研究专门学问的人所称述，而在一般人的口头上，他还要得力于赛金花，才被人搬上舞台，写入小说。他死后还要藉名妓之力，才能在流俗人口中传名，这是洪状元生前万万料不到的。（151—153）

《孽海花》本不是为了塑造晚清新女性而作，其本意是写“文化的推移”，也是为金雯青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同光年间）的文人士大夫（包括曾朴自己）作一个自我写照。在这方面，若以学界小说的专业性衡量，《孽海花》也取得了几乎无可替代的成就。尽管如此，《孽海花》的走红还是出人意料的，连曾朴本人也归之为“幸运”。但是，傅彩云这个形象（尽管曾朴并没有写到庚子事变），在《孽海花》里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到了张鸿的《续孽海花》里，则变得苍白无力、面目不清，这也不是仅仅用文学才华不足就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孽海花》里的傅彩云之所以能写得如此之好，跟曾朴本人看待男女关系的态度大有关系。

与一般人视女性为玩物不同，曾朴从自身的经验里体会到了女性的力量，有时竟有大如帝天之感。这是曾朴为人的极其敏感之处，这“不知不觉的做女性的奴隶”（《病夫日记》233）的感叹，在《孽海花》中的状元金雯青身上，也有不少影迹可寻。不妨说，在金雯青身上，不论仕途所向，还是情感所系，都有曾朴自己的影子。能够把晚清状元金雯青写得如此细腻入微、生动可信，不是仅仅熟于晚清掌故就能够做到的，曾朴在这个人物身上当有自我投射。

《孽海花》最初发表时，曾朴的署名“东亚病夫”也是耐人寻味的。“东亚病夫”本是对外人对国人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身为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曾朴这样，以病夫自命（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不妨对照一下鲁迅《狂人日记》里的“我”）。这个笔名，应该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曾朴是鸦片瘾君子，体素羸弱，病夫于他，是人生的写实；另一方面，东亚病夫，感觉是尤其指涉男性的一个时代隐喻，哪怕是曾经出入于官场情场，春风得意的人

生赢家如状元金雯青者,最终也不免在对家事国事的无力感中一病不起。相对而言,生活在“孽海”之中的女性如傅彩云,就有着年轻泼辣而又强健的生命力。可以说,曾朴的性别观念透过小说《孽海花》,给人一种大大超前于时代的感觉。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面说《孽海花》“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所有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阿英 22)。曾朴的小说,在男女关系的描写上,对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红颜祸水类型,都是颠覆性的,也可以说,是有革命性的。金雯青这个状元的形象,也是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

综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文学立场,回看晚清小说,无论梁启超的“新小说”、鲁迅的“谴责小说”,还是旧文人的“鸳蝴派”小说,都被归入了“旧文学”的营垒,但若以“小说观”和“女性观”之新旧来衡量的话,曾朴的《孽海花》都是“新小说”而非“旧小说”。其“以掌故为小说”的文学实践,不仅打通了章回体与笔记体的传统小说样式,也能以西方文学的小说观念为参照,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期,适成为新旧文学的桥梁。

《孽海花》写了才子佳人,但不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而是其终结;写晚清历史,也不是历史演义体,而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是一种风俗志式的呈现;作为描摹官场士林之小说佳作,不仅在晚清小说中无出其右,至今也难乎为继;从类型小说的角度,也可视之为中国“学界小说”之先驱,上继《儒林外史》,下开《围城》。倘与欧美“学界小说”所描写的士林画像及学术场域对照磨勘,更可知曾朴的《孽海花》有其不可磨灭的文学贡献。

注释[Notes]

- ① 即便是这一段为曾朴所承认的虚构情节,也不是全无来历的。后文当论证之。
- ② 陆士谔的《新孽海花》衔接小说林本《孽海花》一至二十回,自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官笞”起,至六十二回“专制国终撙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止,回目完全袭用曾朴、金松岑所订的六十回回目,1912年9月由上海大声图书局出版,共四册,后因涉讼毁版。
- ③ “学界小说”是欧美现代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斯诺的《大师》、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等是其中的代表。
- ④ 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评价狄更斯小说之语。

⑤ 胡适《追忆曾孟朴先生》中说曾朴“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学的老文人”(《孽海花与赛金花》64)。

⑥ 参见胡樱:《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中的第一章《〈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对傅彩云形象的分析,本节主要受胡樱著作的启发,并多采其说。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A Ying. *A History of Late Qing Fic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蔡登山编:《孽海花与赛金花》。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公司,2013年。
[Cai, Dengshan, ed.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nd Sai Jinhua*.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3.]
- 符静:《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掌故热》,《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09): 152—157。
[Fu, Jing. "On Anecdotes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Shanghai from the Characters of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nd *A Sequel to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09): 152—157.]
- 高伯雨:《听雨楼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Gao, Boyu. *Essays in the Tingyu House*.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胡适:《胡适文存》。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Hu, Shi. *Collected Essays of Hu Shi*. Hefei: Huangshan Press, 1996.]
- 胡樱:《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en in China, 1898—1918*.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古今》33(1943)。
[Ji, Guoan. "Characters in *A Sequel to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Part One)." *Gujin* 33(1943).]
- :《〈续孽海花〉人物谈(下)》,《古今》35(1943)。
[——. "Characters in *A Sequel to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Part Three)." *Gujin* 35(1943).]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Qian, Jibo.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古今》32(1943)。
- [Qu, Duizhi. *About A Sequel to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Gujin* 32(1943).]
- :《听雨楼随笔·序》,高伯雨:《听雨楼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4。
- [——, Preface. *Essays in the Tingyu House*. Gao Boyu.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1—4.]
-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
- [Zeng, Pu.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79;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14.]
- :《病夫日记》,《曾朴全集》第十卷,苗怀明主编。扬州:广陵书社,2018年。
- [——, “Diary of a Patient.” *The Complete Works of Zeng Pu*. Vol. 10. Ed. Miao Huaiming. Yangzhou: Guangling Publishing House, 2018.]
- 吴耀祺:《孽海花考证》,《税务专门学校季报》4. 4 (1923): 62—96。
- [Wu, Yaoqi. “A Textual Research on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Quarter Magazine of Taxation College* 4. 4 (1923): 62—96.]
- 张爱玲:《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 [Zhang, Ailing.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9.]
- 周黎庵:《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与冒鹤亭先生一席谈》,《古今》42(1944): 13—15。
- [Zhou, Li'an. “About the Remaining Figures in *A Flower in a Sinful Sea*: A Talk with Mr. Mao Heting.” *Gujin* 42 (1944): 13—15.]

(责任编辑:程华平)

· 书讯 ·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

作者:李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作为中国古代具有原创性的美学理论,感物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存在着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蕴含着极其丰厚的理论内容。感物兴情、托物寓情是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类型,虚静、神思、应感、妙物、物化等是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在文学艺术的形象创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书简要描述了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哲学基础、发展历史,细致解剖了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类型、方法,发掘了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审美体验特征及其对艺术形象创造的价值。本书意在通过对古代感物美学的深入研究,加深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认识,寻求激活古代美学范畴的途径,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美学提供参照。